

# 剥落生活的糖衣

□刘潇德

在尚未阅读之前，小说集的书名“哀眠”容易让人以为这本书是要渲染某种暗色调的美。等进入故事当中，尤其是读到《哀眠》那篇里“那是属于我一个人的道场，没有人死去，而我圆然哀眠”这一句时，再次回顾“哀眠”这个标题，方才意识到，身处生活的“道场”里，张怡微是在对生活的灰色地带展开独特的呈现，也用她的文字作以解读。

《宿鸟记》里的邹冉让人联想到王家卫电影《阿飞正传》里的“无脚鸟”旭仔，邹冉也在漂浮间寻找何枝可依。她的轨迹看上去似乎有着一个确定而美好的方向，但张怡微在故事中放大了邹冉回到佑仁身边之前的心路历程——对新闻的即时反应、成年以来对香港的印象、走马灯式地回顾和佑仁的感情……充满着犹豫、疑惑、厌烦、忧惧等种种“不美好”。当两人在台北重逢后，无论是邹冉还是佑仁，生活的桥段里都夹杂着对未来的不安。

从写作地理的角度上来看，《哀眠》与《樱桃青衣》也是怀着这样一种“既远且近”的目光。小说的叙事主人公始终记着自己的上海出身，却在香港、台北之间兜兜转转，以此展开不同的“双城记”。《哀眠》中，作为共同好友且单身的“我”观察着鲁西与李智的爱情，将他们性格、生活方式上的龃龉尽收眼底，“我”在他们身上寻找对爱情的理解，试图解答“香港到底有什么光环呢”。对城市与对感情的辨认，在文中构成了一种复调的格局。《樱桃青衣》讲述的是“我”随母亲改嫁到台湾后的故事，但其间夹杂着“我”对上海冬天的回忆，此岸与彼岸之间，亲情与爱情、风物与年景是如此的不同。张怡微细致地写出时间与

地域的变迁，感情如台北这座城市一样的湿漉漉，以及“我”置身其中的彷徨无措。

无论是从写作姿态还是题材选取上看，张怡微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书写都市生活时的失真。《蕉鹿记》和《过房》从青年的立场去审视老年人的情感接续，张怡微没有让代际差异对作品产生隔膜。

《蕉鹿记》中，父亲离世后，母亲在等待与蒋先生重组家庭。在帮助母亲寻获晚年幸福的过程中，与蒋翼的接触也开始让“我”重新思考家庭生活的真相。小说篇幅短小，但却容纳着两代人以及各种突转——遇到了蒋先生，母亲拥有了新生活的可能；遇到了蒋翼，唤起了“我”对童年温情的感受；更意外的是，蒋太太成了“我”一个素未谋面的亲眷……故事终结于一个更大的意外，蒋先生猝然离世，让“我”看到了母亲未曾展现过的悲痛，在旁人的眼光里，母亲的深情让她的年龄降格，她是蒋先生的女朋友，亲情与爱情、衰老与年轻在葬礼上难解难分。

能够看到，代际与意外在张怡微的小说里并无区隔，它们是生活的糖衣，溶于时间的水中，浑然一体。《过房》里的老夏和樱桃也构成了一种血缘以外的情感关系，老夏没能和樱桃的母亲佑琪组成家庭，但是在和樱桃相处的过程中，他与樱桃的感情日渐加深，甚至见证了樱桃的人生大事。恰如《蕉鹿记》一样，张怡微在《过房》中也写出情感的“失而复得”，只不过“失”是难以避免的“失”，“得”却充满了唐突以及难以言喻的复杂。《蕉鹿记》和《过房》的最后，眼看着幸福将至，转眼却发现是“蕉鹿梦，画蛇杯”。剥开生活的那层糖衣之后，张怡微让我们看到的是当下情感的复杂性，寻获、失去、检视在她的作品中远大于对幸福要

义的描述。

此外，小说集延续着《四合如意》里张怡微对数字时代的洞察眼光。《伊丽莎白》里狄三、阿胖和白莹是朋友圈时代的“落伍者”，但是他们情感的隐秘处有赖于校内网的留存以及邮件密码的解密。《免疫风暴》中刘彤对不同人的微信分组，有她对尹悦情谊的前后转变，也给予她释怀父女情感的自由空间。在那个分组可见的朋友圈里，她重新整理了父亲集市册，某种程度上也在勘寻着生活史对家族遗传病史的疗愈意义。类似的，《樱桃青衣》里各种社交软件也以不同的方式，承载着“我”在台湾关于生活工作，以及身处重组家庭内部的种种不适。

恰如小说集中《免疫风暴》这样的篇目涉及药物，有糖衣包裹的药物，通过糖衣来隔绝外界，增加稳定性，同时也掩盖药物的不良气味。面对不同篇目内含的不同症结，张怡微的小说正是要把生活那层美好的糖衣剥落，搅动平静的水面，也暴露其中细枝末节处的不舒服。“疾病”与“关系重组”可以看作小说集的两个关键词，它们构成了重要的隐喻——剥开生活的糖衣细嗅症结处的气息，要比影视剧中赋加美感与煽情显得更真实、更重要，也更能可贵。

十二个故事并非都有一个欢快的结尾，告知读者某种生活的走向或是摹写都市的光鲜亮丽也不是小说集的写作目的。如此看来，张怡微的故事对小说集的书名而言，是“跑题”了，她不是要形容一种美的感受，而是写人物如何在生活中求索，以及各自所面对的庞杂情感。“哀眠”只不过是一刻短暂的休息，世情之下延伸与截除的相互作用，是她小说语言更深层的力量来源所在。



《哀眠》  
张怡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唯一的规则：  
〈孙子〉的斗争哲学》  
李零 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零食里的中国：  
我的零食故事》  
王金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零食是一种情感的纽带。王金玲指出，许多人有过与他人分享零食的经历，分享其实也是一个人际交往的过程。“零食原本是一种物质存在，而当它人为地与某些人、某些事、某些物质等相关联”，进而由此引发一系列的交流故事时，“这一物质存在也就实现了人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零食不再仅仅是一种刺激味蕾的载体，还蕴含着人际交流的情感，以及时代的某些记忆。今天，我们在回忆零食时，即使味道已经淡忘，但围绕零食的那些人、那些事却总是恍若昨天。

同许多人的记忆一样，王金玲笔下的许多零食来自童年的记忆。那时，家家户户多多少少会做一些手工零食，条件好点的，过年还会买些糖果之类的。这也是为什么季羡林的子女对父亲从不带零食回家的记忆如此深刻的原因。

当然，零食留下的并不只有美好，除了日常我们所关注的饮食制作卫生安全外，零食大都含糖量、含热量较高，过多地摄入零食，意味着我们的身体机能从小便超负荷运转，或给身体健康带来沉重压力。不过，并不能因此而否认零食的意义。毕竟在许多人眼里，一个没有零食的童年是不完整的。

# 怎样读《孙子》

□李零

兵书作者，大多是“冷眼旁观者”“事后诸葛亮”，他们可能是政治家，可能是参谋人员，可能是随军记者（类似体育教练和体育记者）。真正的军人，特别是战斗在一线的指战员，一般都不写兵书。

读兵书的，就更是旁观者。

我是旁观者。

我读兵书，主要是两个角度，一个是军事史，一个是思想史。商战、管理类的推广，不属于我的讨论范围。这种学问，是日本人搞出来的，凡是研究这类学问的，大都无师自通，不必用《孙子兵法》装门面。

阅读《孙子》，我有七点建议：

(一)《孙子》的精髓是谋略。研究谋略，最好读战史。西方兵法，最重战史。古典时代是以战史为兵书，现代兵书也喜欢凭战例讲话。谋略是求生术，死里逃生术。兵法是无数流血经验的总结。不知死，焉知生？血的教训，写进战史，谁敢不重视？我国也重视。我国军人读兵书，也要结合战例。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外战史，中外兵书，最好对着读。比如西方传统，重兵器，重实力，重勇气，重财力，重技术支持，重海外扩张，有一股凶蛮之气。他们喜欢强调的东西，往往是我们容易忽略的东西。我们贵谋尚诈，没有这些过硬的东西，谋、诈就被架空了，两者可以互补。

(三)兵法有主客之分、攻守之异，《孙子》尚攻，《墨子》尚守，不一样。孙子和克劳塞维兹也不同，克氏尚力，强调先兵后礼，孙氏尚谋，强调先礼后兵。这些都是正规战。毛泽东兵法强调非正规战。游击战和持久战，都是弱势兵法。弱势兵法更强调诡诈。我们要注意，《孙子》以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兵法。

(四)现代战争是总体战争，军、民的界线被打乱（拿破仑战争的时代就已出现），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是轮着用。《战争论》注意及此，才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说。战略变成大战略。《孙子》论兵，牵涉多广，有君、将关系，有军、民关系，有军赋和出兵的关系，有伐谋、伐交、伐兵的关系。我们要注意，他的谋略也是大战略。

(五)读《孙子》，大家最陌生，可能莫过于其中的兵阴阳说。比如它讲地形，比如它讲火攻，都牵涉这方面的知识。碰到方术知识，碰到方术术语，怎么办？大家可以学一点方术。方术是古人的自然知识，天文、气象、地形、地貌，都属于这种知识。

(六)《孙子》讲武器，讲装备，主要集中在《作战》《谋攻》两篇。讲野战，重装备有马车、牛车、驰车、革车，各种战车；轻装备有甲、胄、戟、盾、矛、橹（蔽橹）、弓矢和弩。讲攻城，有楼橹、轘辒、距堙。《火攻》篇讲的“火”，也属于广义的武器。研究《孙子》，还要有兵器史的知识。武器属于兵技巧。

(七)兵技巧，还有个方面是技击和体育。技击（武术），包括手搏（拳击）、角抵（摔跤）、剑道和射法。体育源于军事训练，比如奥运会、田赛径赛、五项全能，追根溯源，全是军事训练。我国也如此。中国体育，射箭、投壶、蹴鞠（足球）、博弈（六博和围棋），也和军事有关。战争充满狂热，体育也充满狂热，和平时期，体会战争，最好的代用品就是体育比赛。

但我们不要忘记，战争可不是“公平竞赛”。

# 没有零食的童年不完整

□陈凤霞

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因为零食问题，曾给家人留下不好印象。那时季羡林刚回国，儿女还小，先生每次从外地回家时，因“从未给儿女带过零食”，被家人认为极其“小气”，虽然他也会带一些新奇的玩意儿或者书什么的。过去，零食对儿童的意义非凡，尤其在物资紧缺的年代更是如此。

当然，《零食里的中国》所描述的零食已经超出年龄的记忆。作者王金玲将自己吃过的零食分为22大类共116种，大多稀松平常，但有些也较为稀罕。这些零食既有王金玲小时候的美好记忆，也有些是作者因为工作等原因接触到的。作为一名零食吃货，王金玲的零食记忆库确实相当丰富，仅花生一项她就吃过嵊县小红毛、龙岩蒜味花生、台湾炭花生、鱼皮花生等，至于日常我们所见的原味花生、盐花生、五香花生等想必不在话下。

什么是零食？顾名思义，是零碎的食物。所谓零碎，或意在携带方便。零食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记忆，到底什么样的食物才算零食，确实很难界定，本书就将茶叶蛋、春卷、鸡蛋饼等地方小吃归入零食之列。这些过去不是零食，但现在一些零食铺子确实也卖这些东西。零食与主食的区别在于，零食不能当饭吃，

只是闲暇时的消遣之物，通过美妙的味道刺激味蕾。主食则承担着为身体机能输送主要能量的重任。正所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印象中，过去家庭条件有限，大人为了满足小孩嘴馋的欲望，于是千方百计弄出一些讨人喜欢的美味食物。在笔者小时候的零食记忆库里，样品同样非常丰富，如瓜子、花生、炸果、红薯干、米糖等，无一例外来自家庭耕种收获和母亲的手工制作。现在的小孩零食异常丰富，特别是在城镇家庭。尽管如此，大多数小孩的零食记忆里有一样可能无法磨灭，那便是辣条——对许多小孩来说，书包里藏几包辣条再正常不过。

零食折射社会的发展变迁。零食大多易于存放，这是相较于一般熟食而言。过去零食只是逢年过节的简单点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零食已经去掉了节日的光环，成为人们的日常消遣。零食也不再是小孩的独享，成年人吃零食早就司空见惯。零食的进步特征还体现在其制作工艺的推陈出新。王金玲谈到，嘉兴一带喜欢用绍兴黄酒腌制醉鱼干。一开始家里没有冰箱，不能存放太久，做好了就得吃，吃完了就只能咽口水回味。后来冰箱普及，零食记忆时间得以延长。再后来有了真空包装，保存时间更长，携带更方便，吃零食成为日常。

零食是一种情感的纽带。王金玲指出，许多人有过与他人分享零食的经历，分享其实也是一个人际交往的过程。“零食原本是一种物质存在，而当它人为地与某些人、某些事、某些物质等相关联”，进而由此引发一系列的交流故事时，“这一物质存在也就实现了人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零食不再仅仅是一种刺激味蕾的载体，还蕴含着人际交流的情感，以及时代的某些记忆。今天，我们在回忆零食时，即使味道已经淡忘，但围绕零食的那些人、那些事却总是恍若昨天。

同许多人的记忆一样，王金玲笔下的许多零食来自童年的记忆。那时，家家户户多多少少会做一些手工零食，条件好点的，过年还会买些糖果之类的。这也是为什么季羡林的子女对父亲从不带零食回家的记忆如此深刻的原因。

当然，零食留下的并不只有美好，除了日常我们所关注的饮食制作卫生安全外，零食大都含糖量、含热量较高，过多地摄入零食，意味着我们的身体机能从小便超负荷运转，或给身体健康带来沉重压力。不过，并不能因此而否认零食的意义。毕竟在许多人眼里，一个没有零食的童年是不完整的。